

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变化下日本金融外交的角色转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全球价值链研究院 蒙愿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金融学院 高书婷

[摘要] 亚太地缘经济格局正经历结构性重组。中美竞争推动区域金融秩序呈现美元主导与人民币崛起并存的紧张态势,以及IPEF与RCEP等制度框架竞争性共存的格局。在此背景下,日本金融外交的角色发生显著调整。本文系统考察日本金融外交的历史演进、现实定位及其动因与约束。研究发现,战后日本金融外交长期以对美依附为特征,而在当前结构变迁中逐步展现出多维度的战略自主性:在区域层面,通过主导CMIM与倡导“高质量基础设施”强化制度性公共产品供给者角色;在对华层面,通过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审慎立场与PQI框架实施制度制衡,同时保留双边金融合作空间;在对美层面,通过扩大对美投资分担同盟成本,以换取政策回旋余地。总体而言,日本正试图通过构建基于“连接性”的网络权力,将自身塑造为亚太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关键节点。然而,美元体系的结构锁定以及国内财政与人口压力,构成日本角色转型的现实边界。

[关键词] 金融外交 中美博弈 货币互换协议

引言

2026年4月,日本政府发布的《外交蓝皮书》首次将其与我国关系的定位由过去十年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降级为“重要邻国”。这反映出日本在外交层面已将我国视为需通过日美同盟制衡的系统性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孤立的外交表态,而是嵌套在亚太地缘经济格局深层重组进程之中。2022年5月,美国正式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重塑一个将主要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的区域经济圈。此时,由我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已逾半年。强调排他性规则塑造的IPEF与着眼于包容性市场融合的RCEP并行,在亚太地区形成竞争态势。与此同时,金融议题正从幕后走向台前。近年来,美国的金融制裁引发了各国对金融安全与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普遍关注。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则稳步提升,已于2024年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为跨境贸易结算提供了美元之外的替代选项。这些交织叠加的变化表明,亚太地缘经济秩序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一次结构性变革。

在此背景下,金融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然而,与防务安全、能源外交、环境外交(Baldauff,

[收稿日期]2026-01-22

[作者信息]蒙愿如,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区域国别研究,电子邮箱:noelle_miao@qq.com;高书婷,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国际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gao_st@163.com

2024;王一晨、白如纯,2023;常思纯,2012)等领域相比,学界对于金融外交的系统性关注较少。既有研究大多关注更广泛意义上的经济外交。林晓光(2002:7)指出,日本经济外交在战后为恢复本国经济并重新建立对外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升级,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主体性有所增强(吴怀中、从伊宁,2025:59),呈现出更注重安全导向的特征(大矢根聪,2023:33;陈友骏,2024)。针对日本金融外交的研究相对薄弱。Katada(2020:137-141)指出,亚洲金融危机构成了日本区域金融领导力的关键时刻,此后日本通过清迈倡议多边化、亚洲债券市场倡议等机制深度介入东亚金融治理。将日本金融外交置于亚太地缘经济格局重组的背景下的研究仍付之阙如。

考察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变化下日本金融外交的角色转型,既有助于理解日本对外战略调整的内在机制,又有助于从金融与规则层面把握亚太秩序重组的关键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也有助于我国在货币金融合作、区域机制参与和规则博弈中更精准发力,提升在亚太金融治理体系中的主动性和话语权。本文对日本金融外交的历史演进及当前角色转型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动因与局限性。

1 亚太地区地缘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迁

当前亚太地缘经济格局的深层变迁,实质上是一场围绕结构性权力的中美博弈,博弈的焦点正在从传统的生产与贸易领域,向金融与知识结构转移。Strange(1994)将结构性权力界定为塑造和决定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具体表现为安全、生产、金融 and 知识四个基本结构。本文在其理论框架下展开分析。

在金融结构层面,美元霸权与人民币崛起的此消彼长正在重塑区域货币秩序的底层逻辑。美元霸权的制度惯性依然强大,美元仍为东亚货币锚的现实意味着区域内各国在资产负债表与避险需求上仍无法摆脱对美元流动性的深度依赖。然而,俄乌冲突后美国及其盟友将美元体系作为制裁工具的大规模使用,使得美元的公共产品属性显著削弱,其“武器化”倾向引发了各国对金融安全与储备资产多元化的普遍焦虑(薛冰清,2025)。美元已不再仅仅意味着便利性,更意味着巨大的安全敞口与脆弱性。与此同时,我国通过系统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正在为区域提供美元之外的替代性融资选择与清算通道(张明,2022)。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CIPS)的业务量稳步攀升,双边本币互换规模持续扩大,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人民币在东南亚金融合作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亚太地区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各国在安全与流动性上仍深度依赖美元体系,在贸易结算与实体投资上又难以忽视我国提供的广阔市场与资金支持。这种结构性张力意味着,金融结构层面的权力正在经历从“美元单极主导”向“美元—人民币双轨竞争”的过渡,而这一过渡本身就是区域秩序重组的重要体现。

在知识结构层面,中美两国围绕制度与规则的竞争同样激烈。美国通过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试图构建一套涵盖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等领域的排他性规则体系,旨在重塑亚太供应链,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张天桂(2024)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友岸外包策略,意在构建一个将主要竞争对手排除在外的半球化经济圈。我国面对美国的战略挤压,正加速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我国致力于提升产业链的不可替代性,并通过亚投行等新兴多边机构提供公共产品。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已不再局限于市场份额的竞争,而是逐步演变为以制度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为核心的秩序竞争。谁能够定义区域合作的标准与规则,谁就能够在结构性权力的知识维度占据优势位置。

对于日本而言,一方面,它既深度嵌入美元体系,又无法忽视人民币崛起的现实。另一方面,身处

IPEF 和 RCEP 等多重制度网络之中,日本既具有在不同制度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潜能,也承受着在中美之间选边的结构性压力。日本作为中等强国,需要通过多种渠道来获取战略自主空间(王勇辉、陈鹏宇,2025)。在这一背景下,日本金融外交的活跃,本质上是在中美结构性权力博弈的夹缝中,通过金融与制度工具谋求有限自主空间的系统性回应。

2 日本金融外交角色的历史演进

亚太地缘经济格局的结构性重组,构成了日本金融外交必须回应的外部压力。然而,任何行为体的战略选择都不是对结构性压力的即时反应,同时也会受到历史制度惯性的影响。为分析这一影响,有必要先明确金融外交的概念。参考李巍(2013)的定义,本文将金融外交定义为:一国中央政府及其所属具体执行部门,围绕金融事务,与其他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等国际行为体展开的官方交往活动。从具体事务上来看,包括政府间的跨国资金信贷、短期的流动性供给、货币国际使用以及汇率协商。

2.1 战后日本金融外交的制度奠基

在“日美同盟”对外经济战略的思想下,战后日本的金融外交奠定了依附于美国主导秩序的基调。这一时期日本金融外交的总体特征是,在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制度和推动日元国际化,为日后发挥更大影响力奠定制度基础。具体而言,这些举措体现在深度参与国际金融组织、推动日元国际化以及布局政府金融机构等多个方面。

日本在1952年8月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标志着其正式被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接纳。1961年,日本成为发达国家组成的十国集团(G10)的创始国之一,在国际货币体系协调中获得了发言权。1964年4月,日本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并承诺将逐渐取消对保留项目的交易限制,促进资本自由化。同年9月,IMF和世界银行大会首次在东京举行,这被认为是向国际社会展示日本战后复兴成果的重要里程碑。

日元国际化亦是日本金融外交的核心组成部分。1960年7月,日本创设了非居民日元存款自由结算制度,并将日元列入对外结算指定货币名单。日本在1964年成为IMF第八条款国后,日元在国际商品和外汇交易中的使用成为可能。1970年11月,日本允许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外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欧洲日元市场。1972年5月,日本放开对民间持有外汇的管制,并在同年9月,允许非居民在日本国内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债券。1974年7月,凭借在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中的较高占比,日元成为最早纳入SDR货币篮子的16种货币之一。1980年12月,日本颁布《外汇与外贸管理法》,资本项目由原则上限制兑换转变为原则上放开管制。1983年11月,日美共同设立“日元-美元委员会”(Yen-Dollar Committee),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标志着日元国际化进入官方推进阶段。日元国际化作为日本金融外交的重要实践,其核心逻辑在于提升日元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储备中的使用比例,从而增强日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日本金融外交还依赖于其政策性金融体系。从1950年开始,日本逐步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金融体系,为日后的金融外交提供了制度性基础设施。1950年,日本成立日本输出入银行,其宗旨是为进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提供中长期信贷资金。1951年,成立日本开发银行,作为对全国性重点企业、基础工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发放长期贷款的综合政府金融机构。1961年3月,日本成立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旨在促进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发展中区域的产业开发和经济稳定;日后成为日本重要的对外援助机构。

输出入银行和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后来于1999年10月合并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 Ban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JBIC),这成为日本金融外交最重要的政策执行机构,后文将展开说明JBIC在当前日本金融外交中发挥的作用。

2.2 创建与主导亚洲开发银行

若将前述参与国际金融组织视为日本融入既有国际秩序的尝试,创建与主导亚洲开发银行便是日本主动塑造区域金融制度的标志性实践。亚洲开发银行也是日本金融外交极为关键的一大成果,成为日本战后通过多边金融平台积累区域制度影响力的重要起点。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就提出了建立地区开发组织的种种设想,并为此进行了诸多外交努力(刘兴宏,2010)。然而,由于彼时亚洲国家大多被认为更多偏好双边经济援助,日本的区域开发设想均告失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建立地区开发银行的设想才再次提上日程。日本借此契机,提出了成为日后亚行项目蓝本的研究报告,同时也争取美国支持,推动亚行项目落地,成为创建亚洲开发银行的关键角色。1966年11月24日,亚洲开发银行(下文简称为“亚行”)正式成立,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首任行长为日本官员渡边武。日本对亚行的主导地位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出资份额的制度锁定。亚行初始资本10亿美元,日本和美国各自贡献了20%的资本,合计占资本的40%,剩余资本由其他成员分摊。目前两国认股份额各占15.571%,投票权各占12.747%。日本与美国并列为最大出资国,这一出资结构奠定了日本在亚行核心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其次,行长职位的长期垄断。亚行历任行长均为日本籍,且多为大藏省或财务省出身的官员,日本通过行长职位的持续垄断确保了对亚行战略方向和贷款决策的实质性影响力。

2.3 对美汇率协调的被动实践

与亚洲开发银行中主动的制度主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对美汇率协调中经历了被动型金融外交的压力与代价。这一经历也塑造了日本决策层对金融外交战略重要性的认知。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开始持续扩张。日本成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美日间出现贸易摩擦。尽管美国对日本采取了越来越严厉的贸易制裁措施,但收效并不明显。美国认为美元汇率的高估是造成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并决定与主要经济体干预外汇市场来解决这一问题(李石凯,2007)。1985年9月22日,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当时的西德在纽约广场饭店达成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推动美元贬值。日元兑美元汇率从1985年初的1美元兑250日元附近急剧攀升,到1987年底突破1美元兑130日元,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升值超过一倍。日元的急剧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出口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央行在1986年至1987年间五次降息以应对协议对经济的冲击。这种过度的货币宽松最终催生了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其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

广场协议期间的日美汇率协调虽然在形式上属于金融外交的范畴,但本质上是一种被动型的金融外交。日本并非基于自身的战略设计去推动汇率协调,而是在美国主导的议程下被迫响应。正是这种被动的经历,使日本决策层深刻认识到汇率政策与金融外交的战略重要性。

2.4 亚洲金融危机与日本金融外交的自主探索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日本金融外交尝试摆脱对美依赖,向初步自主探索的关键转折点。危机不仅暴露了东亚金融体系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美国主导机制的高度依赖,也使日本意识到,如果不在区域金融危机处置和流动性支持机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其在亚太区域内的地位将难以提高。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具有区域金融自主含义的制度构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洲货币基金(AMF)设想和其后推出的新宫泽构想。1997年9月,日本大藏大臣三塚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正式提出设立AMF的设想,主张由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共同筹资1000亿美元,其中日本单独出资500亿美元、建立一个常设的区域危机救助机构。由于该提案将美国 and IMF 完全排除在外,引发了其强烈反对与否决,这一方案最终夭折。在AMF受挫后,日本并未完全放弃区域金融自主的努力。1998年10月,大藏大臣宫泽喜一提出“新宫泽构想”,承诺提供总额300亿美元的一揽子支持措施,其中150亿美元用于满足亚洲国家经济复苏的中长期资金需求,另外150亿美元用于满足其经济改革过程中的短期资本需求。陆长荣、崔玉明(2017)指出,“新宫泽构想”为日本政府主导东亚区域的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借鉴。

此后,日本在东盟与中日韩框架内推动清迈倡议的形成,则进一步使这种区域金融自主探索制度化。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决定建立区域性双边货币互换网络。该倡议决定,一是完善东盟内部的货币互换安排,使其覆盖东盟所有成员国;二是在“10+3”范围内建立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网络,承诺在必要时向成员国提供适当规模的资金,用于帮助其解决短期国际收支或流动性问题。当然,这种自主探索仍然具有明显边界。美国对亚洲货币基金设想的强烈反对,充分说明日本无法在根本上突破美元主导和美日同盟框架。即便在清迈倡议等机制中,日本也并未获得完全主导地位,而必须在区域合作与对美关系之间保持平衡。这一时期的日本的金融外交行为接近于一种受限条件下的制度试探。

这一时期日本金融外交的总体特征是在依附框架下的有限自主探索。日本一方面无法脱离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另一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寻求区域金融合作的制度化路径。

3 当前日本金融外交的角色

日本金融外交的角色转型,既是对当下亚太地缘经济变局的回应,也植根于战后七十余年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演化脉络之中。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日本金融外交在区域、对我国、对美国三个维度上分别呈现出不同的角色特征。在区域层面,日本致力于成为制度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者。在对我国的关系上,日本采取了竞争性互惠与选择性合作并存的策略。在对美国的关系上,日本则通过金融资源的战略性配置换取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日本正在将自身打造为亚太区域金融安全网的关键节点,同时在中美两大力量之间发挥缓冲节点的作用。

3.1 日本在区域层面的金融外交

与战后长期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模式相比,当前日本在区域金融合作中的角色已由清迈倡议时期(CMI)的资金供给者,进一步叠加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时期(CMIM)的制度供给者。CMI本质上是东盟与中日韩(10+3)框架下的双边美元互换安排网络,各国需分别签署协议。CMIM在此基础上升级为共同决策、储备资金多边化的外汇储备库,标志着区域金融合作从松散的双边安排走向统一的多边机制。在清迈倡议多边机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高海红等,2024),日本始终担任着核心出资方的角色,出资比例占32%,与我国持平,保有了与我国对等的的话语权。在决策机制上,CMIM采取了“基本投票权+出资投票权”的混合结构,鉴于日本和我国的出资比例并列第一,其投票权在成员国中也处于最高等级。在借款乘数上,我国与日本的乘数均为0.5,韩国为1,其他东盟国家为2.5或5倍。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

是以自身外汇储备资源为区域金融稳定提供公共产品,体现了其在CMIM制度架构中的作用。CMIM的运作依赖于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测机制,即成立于2011年的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日本在AMRO的建设中也扮演了关键角色。AMRO的主任职位由中日韩三国官员轮替担任,但日本通过持续的制度参与和人事布局,在AMRO的日常运作中保持着重要影响力。在AMRO成立后的发展中,日本在第二任日籍办公室主任在任期间,便着力推动其从公司转型为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国际组织,其战略意图在于通过赋予AMRO外交豁免权,确保其监测标准的“技术中立性”,从而确立符合日本偏好的区域金融监管规范。这一制度推动行为表明,日本不仅满足于成为CMIM的出资方,更致力于将其塑造为一个具备独立国际法地位的区域金融治理机构。

CMIM的制度化建设并不意味着双边层面的合作已失去意义。在CMIM框架下,日本与东盟成员国之间仍然维持着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表现为CMIM多边机制在双边层面的延伸。CMIM下的协议币种主要以美元与本币的互换为主。以表1中日本与马来西亚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例,2023年9月,日本与马来西亚续签了规模为30亿美元的双边互换协议,该协议允许双方在必要时以本币兑换美元,马来西亚方面还可以马来西亚林吉特兑换日元。这份协议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双边签署,但应对国际收支和短期美元流动性困难的核心目标与CMIM完全一致,其激活条件和贷款条款均受CMIM统一协议框架的约束,本质上是CMIM多边制度在双边层面的执行工具。

表1 有效期内的日本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类型	协议国	签署时间	规 模	互换货币
CMIM	马来西亚	2023年 9月	30亿美元	使用本币交换美元,马来西亚可使用本币交换日元
	韩国	2023年12月	100亿美元	使用本币交换美元
	新加坡	2024年 5月	30亿美元/10亿美元	可直接使用本币互换
	泰国	2024年 7月	30亿美元	使用本币交换美元,泰国还可使用本币交换日元
	印度尼西亚	2024年10月	227.6亿美元	使用本币交换美元,印尼还可使用本币交换日元
	菲律宾	2025年 1月	120亿美元/5亿美元	使用本币交换美元,菲律宾还可使用本币交换日元
BSA	泰国	2023年 3月	240亿泰铢/0.8万亿日元	本币互换
	中国	2024年10月	2000亿人民币/3.4万亿日元	本币互换
	印度	2025年 2月	750亿美元	使用本币交换美元
	澳大利亚	2025年 3月	200亿澳元/1.6万亿日元	本币互换
	新加坡	2025年11月	150亿新加坡元/1.1万亿日元	本币互换

资料来源:日本央行。

表1中标注为BSA类型的协议,是独立于CMIM制度框架之外的双边本币互换网络。与CMIM框架下的协议不同,这类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特点是以本币计价、旨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中本币结算,其规模约2880亿美元。这类协议不涉及美元,双方央行直接交换本币,决策完全独立于IMF和CMIM,核心功能是降低对美元的单一依赖,促进本币在双边经济活动中的使用。从协议国构成来看,除了东盟成员国以外,日本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国包含印度与澳大利亚。这两个国家还同时是“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中的重要成员国。不过,日本与印度和澳大利亚货币互换协议的首次签署时间分别为2008年6月和2016年3月,均早于2017年四边安全对话机制重启之前,因此,这两份协议更多地仍表现在维护金融稳定的层面。日本通过构建以日元为中心的双边本币互换网络,既为区域国家提供了降低

美元依赖的替代性制度选择,又在中国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中保持了日元的区域存在感。

除此以外,日本还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个东盟国家分别建立了双边层面的金融合作发展联合工作组。这些机制超越了简单的资金互换,重点关注包括危机时期加强货币与金融市场的安全网、促进东盟国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共同基金投资东盟国家的国债以促进该地区债券市场发展等议题。借助签署本币结算合作备忘录以及推进与印度的双边金融磋商,日本通过技术援助和市场培育,建立了超越资金借贷的深层金融合作关系。

3.2 日本对我国的金融外交

日本对我国的金融外交在制度制衡与务实合作之间形成张力。日本对我国金融外交的制衡策略最集中地体现在区域金融制度平台上的隐性博弈(蔡亮,2021)。

首先,这种博弈表现为日本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议题上的审慎乃至排拒立场。日本不仅未在2015年亚投行创始成员国申请截止前做出加入决定,而且在七国集团多数成员国纷纷选择加入的背景下,仍然坚持不加入的姿态。这种“不加入”的立场并非被动观望,而是日本在区域金融制度层面对我国实施制衡的重要一环。通过拒绝加入我国主导的多边机构,日本意在维护自身在亚洲开发银行中的主导地位,并遏制我国在区域金融治理中影响力的扩张。

在制度层面,日本采取了更明显的制衡策略,推出与亚投行直接竞争的区域基础设施投资计划。2015年5月,在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数量迅速增加之际,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第21届“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上宣布了一项针对性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计划,通过与亚行合作,在未来五年内向亚洲基础设施提供约1100亿美元的投资。颇具深意的是,安倍公布的1100亿美元恰好超出亚投行计划的资本金100亿美元。与此同时,安倍晋三还提出建立“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Quality Infrastructure, PQI)。安倍在演讲中多次强调“高质量”一词,称“希望以长远的眼光,在亚洲推广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孟晓旭(2018)进一步分析认为,日本提出PQI的根本动机是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试图与我国争夺基础设施建设主导权,是与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进行竞争的表现。

与制度制衡并行的是,日本也在特定金融领域维持了与我国的合作窗口。201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中日两国签署协议的目标是直接使用双边本币进行贸易和金融结算,从而促进两国的经济增长。当日本金融机构面临人民币结算困难时,可向日本央行申请动用该协议下的人民币流动性,从而使得日本金融体系维持稳定。该协议的有效期为3年,到期后,只有经双方同意才可以延期。2018年的协议是在中日关系回暖的背景下签署的。在此之前,受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中日在清迈倡议下的初始协议在2013年到期后未能续签。这表明中日的金融合作存续与双边关系高度同步,缺乏强韧性。

日本对我国的金融外交之所以呈现“制度制衡”与“务实合作”并存的格局,与中日经济关系的特征密不可分。中日两国在东亚生产网络和全球贸易体系中深度互嵌,这种“竞争性互惠”结构决定了日本既无法在制度层面放弃对我国的制衡,也不能在功能层面切断务实合作(程蕴,2019)。

3.3 日本对美国的金融外交

在对美关系上,日本金融外交呈现出一种不同于以往日美同盟框架内的角色特征,由被迫的追随者转变为体系成本的积极共同承担者。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向来与美国的地位并不对等,其主动

性受到限制(唐家林、费建华,2025)。

根据2025年现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美国达成的协议,日本将向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资金构成包括来自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日本出口投资保险公司(NEXI)的股权、贷款以及贷款担保,重点领域涵盖半导体、关键矿产、制药、能源和造船等战略性产业。日本通过大规模对美投资来满足美国的核心经济安全关切,以此换取美国在关税、汽车出口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让步,并巩固日美同盟关系。JBIC传统上聚焦于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融资,其使命曾一度收缩。随着我国影响力的上升和地缘政治风险的加剧,JBIC的角色显著扩张,逐渐演变为日本金融外交中的重要工具。2025年10月,JBIC启动了新的投资机制,部分目的在于支持日本在与美国关税协议下承诺的5500亿美元投资计划。与传统的JBIC项目聚焦新兴市场不同,新机制更加侧重于在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在美国构建供应链。日本财务省还对JBIC的相关规定进行了修订,扩大了其在发达国家的投资范围,包括汽车和制药等行业,而此前JBIC在发达国家的投资范围仅限于某些特定领域。JBIC从开发金融向经济安全工具的转型,以及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的签署,表明日本正在以金融资源为媒介,主动分担日美同盟在运行中产生的经济与安全成本。这种成本分担不同于冷战时期日本被动响应美国贸易压力的模式,而是日本在战略自主意识驱动下,通过金融外交主动塑造同盟关系的新形态。

日本与美国的另一重要金融外交成果是与美联储之间无限额的货币互换安排。日美之间的货币互换并非孤立的双边安排,而是美联储主导的全球央行货币互换网络中的一条关键连线。2013年10月,美联储与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加拿大央行和瑞士央行将原有的临时双边流动性互换协议转换为永久性长期协议,在六国央行间建立了货币互换网络(李扬,2014;徐明棋,2016)。从网络结构来看,这一安排本质上是以美联储为中心、五家发达经济体央行为外围的轴辐结构,美联储事实上成为其他五家央行的最后贷款人。日本央行作为该网络亚洲唯一的成员,既深度嵌入了美元主导的全球流动性安全网,又在亚太区域范围内具备了充当美元流动性二传手的独特地位。理论上,在必要时,日本可从美联储按需借入美元,再通过其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网络转供给区域内中小国家。借此,日本稳固了其美元流动性的区域分配者身份,并强化其在亚太金融安全网中的枢纽地位。

3.4 网络性权力视角下的日本金融外交

如前述所言,日本在亚太区域金融治理体系确立了一种独特的网络性权力。这种权力既不同于美元霸权意义上的强制性货币权力,也不同于单边金融胁迫,而是基于连接与制度创制形成的复合性能力。Castells(2011)将网络社会中的权力分为四种形式,其中最为核心的是网络构造权力(Network making power),即根据特定利益和价值观为网络设定运行程序的能力,以及在不同网络之间进行切换以连接多种网络的能力。卡斯特将这两种机制分别称为“编程”与“切换”。前者是指为特定网络制定规则和意义,决定网络的目标和运作方式。后者是指连接不同网络的能力,通过共享共同目标和组合资源,在多个网络之间建立战略性联盟,从而控制资源、信息与影响力的流动路径。

日本在亚太金融体系中的角色,可以通过“编程”与“切换”两种机制来理解。一方面,它通过主导区域金融制度的规则设计,行使着“编程”权力。即为区域金融安全网设定运行规则和标准。另一方面,它通过同时嵌入美元体系、人民币网络和东盟金融合作机制,发挥着“切换”功能,也就是连接不同网络,使资金、信息和影响力能够在不同体系之间流动。具体而言,“编程”权力在日本参与区域金融安全网的构建尤为凸显。在CMIM的多边治理架构和亚洲债券市场倡议中,日本均通过主导规则制定与制度设计,系统性地将其政策偏好与制度理念嵌入区域合作框架之中。“切换”权力则体现于日本在多

元金融网络间的枢纽与连接作用。日本在中美两大金融体系之间维持着双向接入与策略性对接,通过运用双边本币互换网络等机制,在美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与区域金融安全网之间建立制度通道。日本通过发挥枢纽节点的中介与缓冲功能,增强其在区域乃至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动性与影响力。

4 日本金融外交功能性转型的驱动机制

日本金融外交的功能性转型并不是单一外部冲击下的被动应对,而是由三类动力共同推动的结果。第一,在中美竞争常态化背景下,日本企图通过金融外交维持安全依附与经济嵌入之间的战略平衡;第二,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和区域货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以防御性方式维护日元的关键货币地位;第三,在低增长、低利率和老龄化约束下,日本试图通过外部金融扩张缓解内部增长压力。

4.1 对冲联盟困境与寻求战略自主:竞争性共存下的利益计算

在亚太地区,中美两国既存在制度竞争,又存在经济联系。在此背景下,对于日本而言,这一环境构成了联盟困境。一方面,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需要配合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以获取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作为亚洲经济体,日本又深度依赖与我国的贸易伙伴的联系。金融外交成为日本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并在联盟困境与战略自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一个可选项。首先,日本试图通过金融外交的自主性来避免陷入被牵连与被抛弃的双重风险。完全追随美国的脱钩政策可能导致日本失去我国市场的经济利益。因此,日本在CMIM与我国进行制度合作,并在2018年重启中日双边货币互换,这实际上是在构建一种经济保险,旨在向我国发出信号,即日本虽在安全上从属于美国,但在金融治理上仍保留独立判断与合作空间。这种金融外交的举措有助于日本在中美之间维持一种能使其在两者“夹缝”中生存的平衡。陈友骏和王星澳(2025)指出,在国际政治局势紧张化的大背景下,日本也会更倾向于转向国际金融活动。

其次,日本利用金融力量确立其作为中美之间第三方的地位。在美元仍为东亚货币锚与中美制度竞争加剧之间,存在治理真空。美国虽存在美元霸权,但其对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应急流动性支持的意愿正在下降。因此,日本通过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试图填补美国留下的公共产品赤字,另一方面也尝试为区域国家提供了除我国之外的替代性融资选择。这种策略使得日本在不具备霸权实力的情况下,通过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在中美之间维持战略自主性。

4.2 货币权力约束下的日元区域地位维护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日元在亚太区域货币体系中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Subacchi(2013)指出,当前日本金融外交的货币目标已由扩大日元国际使用的积极推动者转为防止日元被人民币完全替代的防御性维护者,其核心诉求在于确保日元继续保留其作为区域关键结算货币与避险资产的功能。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以日本为核心的“雁行模式”的分工架构下,日本不仅是技术与资本的主要输出方,也是区域内最重要的最终产品市场。日本作为区域贸易与投资枢纽的地位,直接带动了区域内贸易中以日元计价与结算的需求,使日元成为区域内贸易结算与外汇储备配置中不可忽视的货币选项。然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与我国经济崛起深刻重塑了亚太区域生产网络。“雁行模式”的解体使东亚贸易的计价与结算首先经历了一个“去日元化”的过程,区域贸易结算在更大

程度上转向了美元。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我国系统性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人民币开始在区域货币体系中填补日元留下的空间,对日元形成了直接的结构竞争。2024年,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份额中的比例已超越日元,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人民币占比也已超过加元和澳元,稳步逼近日元的储备份额。

面对这一结构性压力,日本政府通过推动与东南亚国家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以及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等金融外交措施,试图通过在金融领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维系日元在区域双边贸易结算中的使用空间。这些举措的战略意图在于,通过提供流动性安全网和本币结算的制度框架,降低东南亚国家使用日元的交易成本与汇率风险,将其维持在日元结算的制度网络之内,防止其在贸易结算中完全倒向人民币或美元。与此同时,维护日元地位也是为保持日本在制定国际金融标准时的话语权。货币的使用范围决定了规则的辐射半径。如果区域内国家在融资和储备中完全倒向人民币或美元,日本将失去对区域债务重组、金融监管标准等议题的干预能力。

4.3 日本国内动因

除了外部地缘与货币因素,日本国内经济因素也是推动金融外交角色转变的内生动力。日本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国内市场萎缩以及长期低利率环境的三重约束,这迫使日本必须通过外部金融扩张来维持国民财富的增长。

一是海外投资收益已成为日本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2024年日本经常账户余额达到28.6万亿日元,其中海外投资收益余额达到39.7万亿元,占日本现价GDP的比例达到6.5%。这一结构性特征意味着,维护海外资产的安全与收益,已成为日本国家利益的核心关切。日本政府积极构建区域金融安全网、推动基础设施融资,能够为庞大的日本海外存量资产提供制度性安全保障,降低因区域金融危机或地缘政治动荡导致的资产损失风险。二是国内长期的超低利率环境严重挤压了日本银行业的利润空间。然而,商业银行的海外扩张面临着汇率波动等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政府层面的金融外交便扮演了护航者的角色。通过与东盟国家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通过JBIC为海外基础设施项目提供长期低息融资,日本政府实际上为本国私营金融机构的跨境业务提供了隐性的国家担保与流动性支持,降低了其进入新兴市场的风险溢价。

5 日本金融外交转型的局限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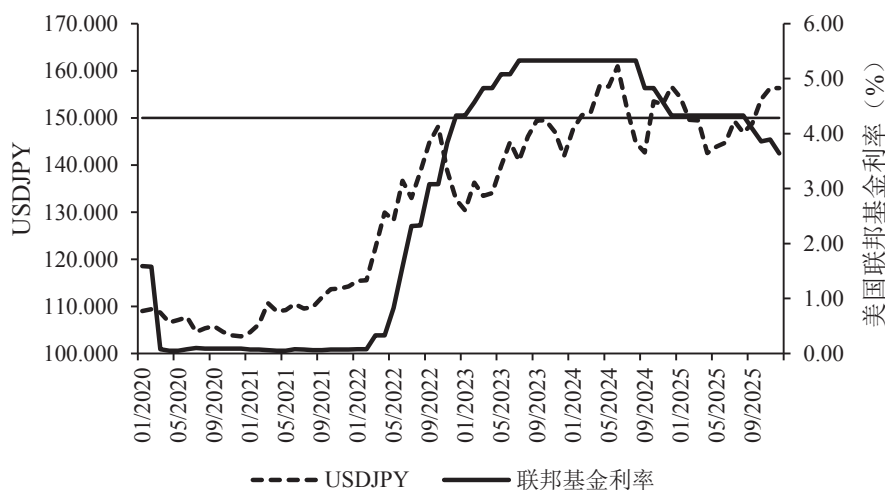
日本试图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货币互换网络与规则体系,在中美博弈的夹缝中确立关键节点的新角色,然而受多重因素制约。深入剖析其权力运作的底层逻辑,不难发现日本的金融外交依然受制于外部单一货币霸权的制度性锁定与国内财政与人口基础的系统性侵蚀等现实约束。

5.1 货币层级的自主性困境

从货币权力的本源来看,日本金融外交的自主性依然受制于美元体系的深度锁定。这种锁定不仅体现在日本持有的巨额美元外汇储备面临估值风险,更体现在其作为区域流动性提供者的能力始终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周期的强约束。

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负外部性威胁着日本金融外交的根基。如图1所示,当2022年美国激进加息使得联邦基金利率飙升至5%以上时,日元一度跌破150关口,创32年新低。这种剧烈贬值直接冲击了日

本金融外交的有效性。一方面,日元汇率的剧烈波动显著降低了东盟国家在危机时刻通过CMIM或双边互换协议借入日元的意愿。另一方面,为了维持日元汇率稳定,日本被迫动用超9万亿日元外汇储备进行干预,这种为了内部维稳而进行的资源消耗,不仅挤占了其对外提供流动性支持的资金池,更因抛售美债而引发了与美国财政部的潜在政策摩擦。在美元霸权体系下,日本的金融政策选择被迫受限,其开展金融外交的“弹药库”因此被削弱。这种“不对称相互依存”结构使得日本在尝试通过双边外交手段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时,面临着来自美联储周期及其引发的市场动荡的巨大压力。不仅如此,日本试图引导区域金融架构的努力也因自身的战略依附性(项昊宇,2022)而面临阻力。因此,尽管日本在国际金融舞台上志在成为一个积极的议程设置者,这方面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国政策动向的掣肘。



资料来源:CEIC。

图1 2020年以来日元汇率(左轴)及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走势

5.2 财政僵化与人口危机下的能力透支

除了外部的依附性,日本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基本面,也对其长期充当区域“最后贷款人”的能力构成了严峻的内生约束。金融外交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而安倍经济学留下的遗产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的资源困境。

一方面,超宽松货币政策的长期化与财政赤字的累积,极大地压缩了日本政府的政策空间。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长期居世界首位,2024年该比重高达237%。为了维持国债市场的稳定,日本央行长期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YCC)政策,导致国内债券市场功能扭曲,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到损害。在如此严峻的财政约束下,日本政府通过JBIC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融资的能力,并非没有边界。5500亿美元对美投资协议中绝大部分资金以贷款和贷款担保形式提供,而非直接股权投资,正是这种财政约束下的策略性选择,它反映了日本在维持与美国金融外交积极性的同时,不得不精打细算地控制实际财政风险。

另一方面,不可逆转的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正在侵蚀日本债权国地位的根本,即国民储蓄率。历史上,日本强有力的金融外交建立在其庞大的经常账户盈余和充沛的家庭储蓄之上。然而,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日本家庭储蓄率已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支撑日本作为资本输出国的资金池

正在枯竭。虽然目前日本依靠企业部门的盈余和海外投资收益维持着经常账户顺差,但这是一种更为脆弱的平衡。从长远来看,一个劳动力萎缩、储蓄枯竭的国家,将难以像过去那样通过提供资本来购买区域影响力。日本金融外交的物质基础正在经历缓慢但确定的衰退,这一趋势构成了其角色转型最深层的结构性限度。

6 结 语

本文通过考察亚太地缘经济格局变化下日本金融外交的历史演进、策略布局与结构性制约,发现日美同盟仍是其对外战略的基轴,对华制衡也从未真正松动。但在“站队”与“谨慎”之间,日本通过金融外交争取一种有限的行动空间。

日本既深度嵌入战后八十余年所依赖的美元体系,也无法忽视依赖于我国经济的事实。这种双重依赖迫使日本必须寻求新的战略路径。在此背景下,日本的金融外交已不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的配套工具,而是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运作逻辑。在区域层面,它不再满足于充当单纯的出资方,而是通过主导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制度设计、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标准的国际化,试图扮演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在与我国的金融外交中,它一方面在亚投行等议题上保持审慎距离,另一方面又在双边本币互换等功能性领域保留合作窗口。在与美国的金融外交中,它则以创纪录的投资规模分担同盟运行的经济成本,以此换取关税减让与更大的战略回旋余地。

日本金融外交的核心目标在于将日本塑造为亚太金融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节点。它既承接美元体系的信用背书,又连接着区域内对流动性与发展融资的巨大需求。日本的这种“连接性”的网络权力包含双重机制。其一体现为“编程”能力,即通过为区域金融安全网制定规则与标准,将自身的制度偏好嵌入合作框架。其二体现为“切换”能力,即利用其同时身处美元体系、人民币网络与东盟合作机制交汇点的特殊位置,在不同网络间灵活调度资源与影响力。这种权力形态并不依赖强制,却使日本在两大力量的夹缝中获得了有限的行动自由与一定程度的不可替代性。这一转型并非没有边界。广场协议的历史记忆与亚洲货币基金构想被美国否决的教训,始终提示着日本金融自主的上限受制于日美同盟框架。日本居高不下的公共债务与持续萎缩的国民储蓄,也在不断侵蚀其作为资本输出国的物质基础。准确剖析日本金融外交的底层逻辑,有助于我国精准识别其战略动向,从而在双边金融互动中保持战略清醒与政策韧性。

参考文献

- 大矢根聪,李璇夏.战后日本经济外交路线的演变[J].日本学刊,2023(1).
- 王勇辉,陈鹏宇.大国竞合背景下日本-印度尼西亚海上安全合作[J].日语学习与研究,2025(3).
- 王一晨,白如纯.地缘能权视角下的日本能源外交——以对非洲合作为例[J].现代日本经济,2023,42(1).
- 刘兴宏.日本重返东南亚的多边途径探析——以亚洲开发银行为例[J].东南亚研究,2010(5).
- 刘兴宏.亚洲开发银行成立的核心动力因素分析[J].国际论坛,2010,12(3).
- 李石凯.“广场协议”后的美元/日元汇率与美日双边贸易失衡[J].现代日本经济,2007(4).
- 李扬.积极应对六国央行货币互换升级[J].中国外汇,2014(1).
- 李巍.金融外交在中国的兴起[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2).
- 吴怀中.从伊宁.国际变局下日本经济外交的战略性调整论析——基于“地缘经济学”的分析视点[J].东北亚论坛,2025,34(4).
- 张天桂.“印太经济框架”新进展及其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J].国际论坛,2024,26(4).

- 张明. 全球新变局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的策略扩展——从“新三位一体”到“新新三位一体”[J]. 金融论坛, 2022, 27(11).
- 张蕴岭, 潘雨晨. 新形势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J]. 亚太经济, 2022(5).
- 陆长荣, 崔玉明. 日元国际化重启及其对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的启示[J]. 日本学刊, 2017(5).
- 陈友骏, 王星澳. 日本对内直接投资促进战略的新动向评析[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25(5).
- 陈友骏.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历史性演变: 内外因素合流下的递进式嬗变[J]. 现代日本经济, 2024, 43(5).
- 林晓光.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与ODA[J]. 现代日本经济, 2002(6).
- 孟晓旭. 日本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构建及与中国的竞争合作[J]. 现代日本经济, 2018, 37(6).
- 项昊宇. 美日同盟中日本对美战略依附性考察[J]. 东北亚论坛, 2022, 31(6).
- 徐明棋. 央行货币互换: 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J]. 社会科学, 2016(3).
- 唐家林, 费建华. 日本印太战略的多重身份追求[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25(5).
- 高海红, 杨诗琦, 杨盼盼. 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迈向区域货币基金[J]. 国际经济评论, 2024(1).
- 常思纯.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浅析[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2(5).
- 程蕴.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日关系: 竞争性互惠结构的内涵与作用[J]. 日本学刊, 2020(S1).
- 蔡亮. 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 “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J]. 日本学刊, 2021(2).
- 薛冰清. 美元“武器化”危害与人民币国际化策略[J]. 经济论坛, 2025(5).
- Baldauff N. Japan's defense engagement in the Indo-Pacific: Deterrenc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stable order building[M]. Cham: Springer, 2024.
- Katada Saori N. Japan's New Regional Reality: Geoeconom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 Manuel Castells. A Network Theory of Pow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1(5).
- Subacchi Paola. Expanding Beyond Borders: The Yen and the Yuan[R]. Tokyo: ADBI Working Paper No. 450.
- Susan Strange. States and Markets, 2nd ed[M].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94.

The Transformation of Japan's Financial Diplomacy under the Changing Geoeconomic Landscape of the Asia-Pacific

MENG Yuanru & GAO Shuting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 Asia-Pacific geoeconomic landscape is undergoing profound restructuring. Sino-US competition has driven shaped the regional financial order, showing the tension of the coexistence of the US dollar dominance and the rise of the RMB, as well as the competitive parallelism of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such as IPEF and RCEP. In this context, the role of Japan's financial diplomac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adjusted.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ractical positioning, as well as the motivation and constraints of Japan's financial diplomacy. The study finds that post war Japanese financial diplomacy has long been characterized by depende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s gradually shown multi-dimensional strategic autonomy in the current structural changes: at the regional level, it strengthen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public goods suppliers by leading CMIM and advocating "high-quality infrastructure"; At the China level, it implement institutional checks and balances a prudent stance on the AIIB issue and the PQI framework, while retaining room for bilateral financial cooperation; At the level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shares the cost of the alliance by expanding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exchange for policy maneuver. Overall, Japan is trying to shape itself as a key node in the Asia-Pacific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by building network power based on "connectivity". However, the structural lock-in of the dollar system, Coupled with domestic fiscal and demographic pressures constitute the realistic boundary of its rol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financial diplomacy; Sino-US rivalry; currency swap agreements

(责任编辑:王晨萌)